

烟台故事

波音公司首任总工 曾就读烟台海军学堂

徐源和



王助

上世纪80年代,新加坡《联合晚报》在撰文介绍美国波音飞机制造公司发展史时,称该公司创业之时,曾聘请一位中国人为第一任总工程师,从而扭转了当时的困境。这位总工程师,就是曾就读于烟台海军学堂的王助。

王助,1893年出生于北平,因庚子之乱,随家人迁居原籍河北省南和县普济桥村。1905年,王助小学毕业后,考入烟台海军学堂。

王助到烟台海军学堂时,学堂刚刚开办两年。新校区还没建设,学堂就在海军训练营的营区里。当时距离甲午海战不过数年,国家经济困难、经费匮乏,这就决定了烟台海军学堂在创办上要速成,在人才培养上要求多求快。因此,烟台海军学堂的开办章程与以往不同。以往的海军学堂多是每年招生1次,而烟台海军学堂则为每年2次;以往的海军学堂通常是5年毕业,而烟台海军学堂缩短为3年;以往的海军学堂开办时一般都有驾驶、管轮、制造等几个专业,而烟台海军学堂开办时只有驾驶一个专业。教官主要来自天津水师学堂和江南水师学堂,还聘请了英国人白赛德担任教官。

新生到校后,根据成绩分班教授。教学仿照英国奥斯陆海军学校方式,学生课堂上使用的课本全部是英文原版书。王助在烟台海军学堂学习了英文、代数、地舆、几何、三角、绘图测量、帆缆、枪炮、天文等课程和风涛、海流、电学、气学以及操演海阵、施放鱼雷和水雷等技能。夏天不放假,要加强水上的练习以及驾驶风帆舟楫。王助在这里受到了严格的训练和较系统的新式教育,为他后来的出国深造,在知识上、意志上、体魄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1906年,中国首次派遣留日海军学生。这是对各海军学堂实力的一次检验,烟台海军学堂有20余人入选,数量居各海军学校之首。同年,烟台海军学堂又有2人被派往美国留学。王助于1909年被公派到英国留学。

到达英国后,王助经过一段英语补习,次年考入阿姆斯特朗海军大学,学习机械工程,又进威克斯工厂实习,后来又到德兰姆大学机械科学学习。1912年暑假期间,他与留英同学一起凑了两英镑,跟随飞行家彼特在温德湖上飞行了一次,从此与航空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,英国忙于战事,王助等人于是转赴美国继续深造。

1915年9月,王助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航空工程。当时能出国的中国人少之又少,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后,王助不免感到孤单。当时许多人都认为中国人是落后、愚昧的,王助在学习中遭受了不少嘲笑和白眼。一心求学的王助对这些杂音毫不在意,始终埋头学习,在休息之余还主动到飞机工厂实习,研究飞机零件,经常在工厂一待就是一整天。他夙兴夜寐、刻苦学习,仅用9个月时间就修完了应学的全部课程,于1916年6月获得了航空工程硕士学位。学习期间,尽管学业繁重,王助总是抽出时间去寇提司、波音、通用等飞机厂实习。毕业后,因国内时局混乱,王助等人被迫滞留美国。

这期间,美国波音飞机厂聘请王助担任该厂第一任总工程师,当时他年仅24岁。情况是这样的,美国波音飞机厂的前身是创立于1916年的太平洋航器材公司,创始人是威廉·波音和海军军官威斯特夫。因威斯特夫要上战场,公司便由威廉·波音打理,威斯特夫在出征前,把自己的同学王助推荐给了威廉·波音。波音飞机厂当时仅有21名员工,由于技术等原因,发展遇到极大的困难,让人意想不到的,本来已经奄奄一息的公司,在第一任总工程师王助的手上起死回生了。

王助到任后,对工厂先前研发的B&W-1型水上飞机进行有效改造,成功解决了飞机设计上的问题,提高了飞机起降的成功率,造出了第一架双浮桶双翼B&W-C型水上飞机,并通过了美国军方的测试。该飞机试飞成功后,一次就被美国海军订购了50架,正是这笔订单彻底改变了波音的未来,波音飞机厂从此一跃成为行业翘楚。

为了发展祖国的航空事业,王助放弃了波音飞机厂优渥的待遇,1917年冬毅然回国。回国后,王助一直从事飞机的制造、研究、维修和组装工作,先后研制出我国第一架水上飞机“甲型1号”;设计出世界第一座水上浮动飞机库,成功解决了水上飞机的停置难题;主持制造诺斯罗普中型轰炸机,装备空军。他还担任过飞机制造教官,倾心培养飞机制造人才,曾聘请钱学森等学者为研究员,进行专项课题的研究。王助还以个人名义写信给自己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导师推荐钱学森。在钱学森被美国软禁、无法回国之际,王助十分焦急,想尽办法帮助钱学森,为其顺利回国解决了不少麻烦。

在抗日战争时期,王助曾主持中国航空研究院,亲自担任飞机组组长,研究飞机的制造和试飞等有关问题。经王助建议,在飞机上安装了后小轮,这项重大的改进很快就被认可推广,使用至今,国际上称之为“王助轮”。王助一生著有《飞机设计手册》《飞机名词草案补遗》《航空研究院简史》等专著,培养了数百名中国第一代航空工程人才。

2005年,西雅图飞行博物馆在“红色谷仓”(波音早期的办公室,现为西雅图飞行博物馆的一部分)举行了盛大的王助个人主题展览的揭幕仪式,众多航空界的领袖人物出席,向博物馆赠送了一面刻有王助肖像的铜匾。2007年2月,中国发行的“中国航空群英谱”16枚个性邮票中,王助在列。2016年12月,波音公司举办了“王助杯”创意飞行大赛。正如有的媒体所说:“因为王助,在世界航空发展史上,中国没有缺席。”

往事如昨

给俺起外号的教书匠

赖玉华

“秃老亮”一度是我特别厌恶的外号,这名字拜教书匠孙老师所赐。他是我家的房客,确切说也是我家西邻的女婿。

挨着我老屋的西邻,有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,将近三十岁的她,在东北关联中教初中政治。有文化的女孩子眼光不一般,眼瞅着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,自己就是不着急,可急坏了她的父母,到处托人说媒。

有一天,一位好心的老师拿着一张照片来找姑娘的母亲,说这次说媒准成。照片上的小伙子虽然三十多岁了,但有文化,是东北师范大学毕业的高材生,毕业以后留校任教多年,还当过物理系负责人。福山为了发展,向全国各地引进人才,这小伙子过些日子就来报到。媒人说,照片先给你姑娘看看,中不中。

姑娘的母亲一眼就相中照片上的小伙子,赶紧找出她姑娘的照片给媒人,让他帮忙从中牵线搭桥。邻居姑娘回家后,看到照片上的小伙子眉清目秀的,脸上露出羞涩的笑容。就这样,他们靠着一张照片、一纸书信走到了一起。真应了一句话,“有缘千里来相会,无缘对面不相逢”。小伙子老家是东北的,到了福山人生地不熟,没房子怎么结婚?邻居想到我们家的东厢房暂时闲置,和我奶奶一拍即合,于是那东厢房便成了他们的婚房。

他们结婚时,我已经四岁了。那一年秋天,我天天喊头疼,头皮被我抓得流淌着脓血。我母亲不知道咋回事,还以为我手脏抓破头皮感染了。幸好这对新婚夫妇,他们告诉我母亲,这孩子头疼这么厉害,得去福山医院好好看看,说不准是得了蛇盘疮。去了医院一检查,果然是得了蛇盘疮。一般人的蛇盘疮长在腰上、腿上居多,没想到我长在头上。为了上药方便,母亲索性去理发店,给我剃了个光头,脑门光溜溜得贼亮。

新婚夫妇下班后看着光头的我,都忍不住笑了起来,说这孩子剃着光头蛮像男娃,你奶奶梦里都想着抱孙子,以后就留着光头让你奶奶当孙子养吧。接着,他们告诉我母亲,这孩子身子骨瘦弱弱的,主要是免疫力太差、体内湿热有火,不妨多吃点败火消炎的食材,像绿豆、马齿苋、冬瓜、白萝卜等,都有清热消炎的作用。

母亲每天把我抱到家里炕上仔细地上药,说实话,每次上药我都是钻心地疼,疼得哇哇大哭。每次我一哭,东厢房的那个孙老师操着一口东北口音就来逗我,喊我“秃老亮”。他还说着一串讨厌的顺口溜,“远看像灯泡,近看是脑

瓢,细细数青丝,没毛”。我一听这话就不哭了,握紧小拳头去捣孙老师。不管我怎么闹腾,对他拳打脚踢,孙老师就是不恼,还依然如故笑嘻嘻叫我“秃老亮”。长大了我才知道,这是为了让我转移注意力,那样我就不会挠头了。

不久,这对小夫妻有了房子,搬走了。等我再次见到孙老师时,他已在福山十七中任教。那是1985年,我刚上高中。第一学期期末考试,我的物理科目居然考了个很不错的成绩。恰好福山区要搞个数理化竞赛,每班抽出两三位同学放学后在东南面教学楼一楼一班集中上辅导课。说实话,在福山十七中念书都半年了,我还是第一次上一班所在的这栋楼。第一天上辅导课我去得很早,只见一个中等个头,鼻梁架着一副眼镜的老师在教室讲台椅子上坐着。我进去叫了一声“老师好”,老师转过身,打量着我,看了我老半天说道,你不是东北关村赖家那个爱哭的小不点“秃老亮”。我拍了拍脑门,想起来了,这老师就是那个给我起外号的“老孙房客”!于是我向老师诉苦,他起的这个外号,直到我头顶的蛇盘疮治愈了好几年才没人叫了。

转过年来,孙老师却调走了,此后我再没见到他。直到前几年,我家的电脑坏了,去修电脑。真是无巧不成书,修电脑的老板竟然是孙老师内人的外甥。在聊天中得知,当年孙老师和他的爱人先后调到烟台教育学院任教,孙老师被物理系聘为副教授直到退休。据说孙老师在三尺讲台上教书育人的同时,还利用业余时间研究地磁科学,发表论文数十篇。其关于地磁的一篇论文解决了一个全国学术界争论多年的问题,他的论文还间接促使高校教材进行了改写。也因此,孙老师被国家和省级物理科协聘为理事,被国内多家物理科学期刊聘为编委。

然而,孙老师却已经离世了。不知怎的,当得知这个消息时,我心里突然变得空落落的。我无法相信那个温文尔雅、学识渊博的孙老师就这么走了,无法相信他会舍得丢下爱他入骨的爱人离开,也无法相信那个幽默风趣喊我“秃老亮”的他会这么轻易被病魔带走。忆及做邻居时的往事,孙老师夫妇与我们家那么融洽、那么亲切,不由泪眼朦胧。

“一朝沐杏雨,一生念师恩”,虽然我孙老师相处的时间不多,却是我人生中一段最美好的回忆。孙老师生前留有遗嘱,那是一张催人泪下的告别书,他的儿子也感叹:“父亲一生光明磊落,留给我的最大财富就是他的为人处世之道……”